

羊城文物珍藏選

GEMS OF GUANGZHOU RELICS



羊城文物珍藏選

GEMS OF GUANGZHOU RELICS

廣州市文化局

羊城文物珍藏选

出版：广州市文化局

编辑：广州市文化局

承印：东莞有利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1/16 印张 17

版次：1997年5月第1版

印次：1997年5月第1次

印数：0 001-6 000

广州市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97穗印准字第0038号

《羊城文物珍藏选》编委会

主 任：曾石龙

副 主 任：陈玉环 麦英豪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卢延光 麦英豪 陈 滢 李 明
李月梅 肖亢达 张嘉极 何民本 林齐华 崔惠华

主 编：麦英豪

副 主 编：何民本 陈 滢

撰 稿：（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庆昌 王文健 方焕放 韦承红
麦英豪 陈 滢 陈坚红 何民本 苏振兴 岑端心

林齐华 崔惠华 黄海妍 程存洁 曾土金

装帧设计：梁丽辉 韦承红 黄唯理

摄 影：莫健超 何民本



目 录

见证·启迪·借鉴（代序）

铜铁器

玉石印玺

陶瓷器

工艺美术

书画

图版解说

后记



见证·启迪·借鉴

(代序)

麦英豪

1996年夏，广州市属文物单位联合在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举办《羊城文物珍藏》展览，作为向广州建城2210年的庆祝；这次展览汇集了各单位几十年积聚的藏品中的精华，奉献给广州市600多万人民和广人的文物爱好者，共同鉴赏。

广州城的始建年代，既有信史可征，又有近年考古新发现可据。史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推行郡县制。随后又发兵北却匈奴，南平百越，于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今两广的岭南大地，于此设置桂林、象、南海3郡，南海郡的郡治在番禺（今广州市），这是见诸《史记》和《汉书》的记述。有郡治当有城邑，所以前214年实为广州城建的始年。秦的国祚甚短，只有15年，秦始皇死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原秦将南海尉赵佗乘中原战乱之机，据有岭南三郡，建立南越国，以番禺为都城。《史记》、《汉书》称之为番禺城，这也是广州城最早的名字了。

近年，广州考古工作对番禺城的问题又有突破性的新发现。1983年在象岗发现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的陵墓，墓主身上随葬9枚印玺，其中1枚为龙钮“文帝行玺”金印，这枚金印对广州城建历史来说有其特别重要含义。因为自秦始皇的玉玺为刘邦所得，成为传国玺，以后历代帝王的印玺成了封建王朝中最高权力的象征。在西汉初年，南越王王国定都广州，长达93年，这枚“文帝行玺”金印正是这段历史的物证。1995年下半年在今广州市区中心的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城隍庙西边，发掘出南越国宫署的部分遗迹，在遗址的一块大石板上凿刻有一个斗大的秦隶“蕃”字（番禺的简称），真是“一字千金”。这个“蕃”字既是岭南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石刻文字；更为重要的是，宫署是南越王国最高层统治者的

的居处地，为当日番禺城的核心区。《史记》、《汉书》的南越传均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越，火烧番禺城。考古发现南越国宫署走道有毁于大火的遗迹，正与文献记载相符，番禺城的坐落位置得到确认了。一枚“文帝行玺”金印，一块“蕃”字石刻，成了广州建城2210年最具权威性的历史物证，可说是广州这座二千年历史文化名城的两件重宝。

二

现代田野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在广州的出现都比较早。1931年，一个民间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在广州成立，它编辑出版的《考古学杂志》（创刊号）也同时面世，这期间还发掘过几座汉晋古墓，开创了广州地区有现代田野考古的历史。到本世纪50年代，在配合市区和郊区的各项经济建设工程的施工，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广州与西安、洛阳、南京、长沙等地成了当时全国的“考古发掘的重要据点”（《新中国考古的收获·序言》，文物出版社1961年）。回溯四十年来，广州地区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除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停顿外），持续不断，先后发现多处古文化遗址和自秦汉至明代的大批古墓葬，其中两汉墓逾千座，汉墓的出土文物亦最为丰富。还发现了唐代建筑遗址、南汉城的排水涵洞遗迹、宋代城基遗址，还有北宋年间专烧外销瓷器的西村窑等。至于被誉为广州秦汉考古三宝的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和象岗南越王墓，同属70年代以后的考古新发现。

广州博物馆的前身——广州博物院成立于1929年。本世纪50年代初，广州市人民政府着手建立文物保护的专门机构，随后又分别筹建包括广东革命历史方面的、广州城市历史的、工艺美术方面的专业博物馆和一批纪念馆和文物保管所（设在文物保护单位内）。为了收集、保护流散于社会上的文物，为博物馆提供有人藏价值的文物，于1960年成立广州市文物店。自此，这些文物单位肩负起广州市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文物建筑的维修保养、各种历史文化艺术珍品的收集、保存、研究、宣传展览的重任。

文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它具有教育、可供借鉴、为科学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重要作用。博物馆由于拥有多（入藏品愈多愈好）、精（珍稀品以及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全（包含各门类的、自成系列的）的收藏，让参观者从中获得各种历史信息，所以被视为学校的第二课堂，成人的终身学校。事实上，一个博物馆拥有藏品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直接关系到这个博物馆的社会声誉和实际的业务开展的。比如，中国的故宫博物院、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罗浮宫博物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等都因其收藏的多、精、全而享誉世界。广州的博物馆在国内来说，其藏品的数量与质量虽然都无可与几个大城市的博物馆相比拟，但作为地方性质的博物馆，它收藏有丰富的地方文物、文献，因而显出它的特色。广州的几个博物馆其藏品来源不尽相同：例如广州博物馆是以本地地区的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为其主要收藏，同时又注重城市历史发展和民俗文化实物的征集。广州美术馆的藏品则以广东地区书画家的名作为重点而又面向全国，建馆初

期有赖前广州市市长宋光的关怀支持,从各方面为其搜罗、征购书画而奠定了藏品基础,其后又得杨铎先生、李凡夫先生等的大批捐赠,还有著名学者容庚教授所藏的近千幅字画,通过价赠的方式,全部交山美术馆选藏。经过近三十年的致力搜罗,该馆藏画盈仓,已跻身全国美术博物馆藏画的前列。又如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它以广东古代至近现代的各种优秀民间工艺珍品为其入藏重点,但又面向全国各地。该馆拥有逾千件明清以来的石湾艺术陶瓷,成为国内外博物馆中收藏该窑制品最丰厚的单位,深受陶瓷爱好者的赞许,又因得到香港杨铎先生把毕生所藏陶瓷、铜器、竹木雕刻品等5000多件无偿捐赠,使该馆的藏品倍增,跃居广州各博物馆拥有藏品数的首席。至于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逾千件(组)的文物,成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的重要典藏。这座遗址博物馆建成未到十年已是遐邇闻名,主要是该墓出土文物中有不少是全国罕见的精品和珍稀品;加上又有香港杨永德伉俪把多年来搜集得来的二百余件唐宋至元代的陶瓷枕慷慨捐赠,遂令该馆的入藏别开生面,倍添异彩。广州文物店建店以来,向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馆、广州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文物研究单位提供数以千计的文物珍品。展品150号元代青花船形水注和155号清雍正青花赏瓶两件真稀品,就是该店从民间收购得来,前者已交给广州博物馆入藏。而今该店已跃上全国仅次于北京、上海而具有一定影响的文物专营店。

三

博物馆藏品必然是文物或自然的标本,但不是所有的文物或自然标本都可成为博物馆的入藏。文物藏品必须具有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价值,这是入藏的基本条件。判定年代,辨明真伪,则是确认文物藏品价值的前提。一般来说,对传世的文物,首要的是鉴定年代和判明真伪,这是决定它所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前提。本选集特意选刊两件战国式铜镜的腰品,其仿制之精,几可乱真;同时又指出它的破绽所在,以供鉴别。至于考古发掘品,需要断代而不存在真伪问题。广州各博物馆的藏品,从60年代开始,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和我省市的文物鉴研专家先后多次进行鉴定,确认其年代与级别。是次展出的藏品侧重在古代史和工艺美术方面的,尚未包含革命历史方面的收藏。展品系由广州博物馆等6个单位选送,共262件(组),概纳为铜铁器、玉石印玺、陶瓷器、其他工艺以及书画,书画因要避免长时间的照射受损,分批轮换展出。名之曰珍藏,会否有点儿“敝帚自珍”哩?愚以为这要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了。因为事物是相对的,是比较而言的,既曰珍藏,自有其可珍处。例如,展出的商周青铜器中,展品1号的刺鼎,器内壁有铭文51字,已确认为西周穆王(约前1001年)时,可视作西周铜器断代的标准器。展品8号与9号同为秦戈,其状虽然一般,但历史价值重要。前者出自广州东郊区庄一座秦墓中,戈的内部刻有(秦始皇)“十四年咸邦”等铭文;后者出自象岗西汉南越王墓,戈内处刻有(秦惠文王后元)“王四年相邦张义”等铭文。张义即张仪,与苏秦同为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这是岭南地区考古发现唯一有秦的纪年的两件青铜兵器。联系到1976

年江西遂川出土的一把戈，内上刻有《秦始皇》“廿二年临汾守璋”的铭文，可以认为这是《淮南子·人间训》所载的，秦始皇派遣统一岭南的五路大军中，“一军守南野之界”（遂川在秦时属南野境）和“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遗物，弥足珍贵。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首推象岗南越王墓，该墓随葬铜器400余件（套），数量大，品类多，有不少属珍稀品。其中3套青铜编钟，3件铜烤炉（展品12号），多件越式铜提筒和铜熏炉（展品13号），最具地方特色。其中8件一套的铜勾（展品18号），所刻铭文说明系由南越国乐府的工师监制，可见当时广州地区的铸铜手工业已较具规模。9件刻有“番禺”或“蕃”字铭文的汉式与越式铜鼎（展品11号），是最能说明“蕃”即为“番禺”简称的物证。铜镜既是实用器，又是工艺美术制品。南越王墓出土的39面铜镜，有带托镜（展品30号）、漆画镜、秦式镜、楚式镜等珍品，其中一面六山纹镜（展品26号）是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得见的出土品，极为珍稀。至于五山纹镜，在岭南至今未有出土，湖南长沙偶见于战国墓中。展品27号的一面五山纹镜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所藏，亦属难得。至于三国吴的纪年镜，晋的纪年镜、唐代金银平脱镜和唐贞观七年（633年）铁镜等都填补了广州藏镜的空缺。根据文献记载，过去一直认为东晋咸康年间邓岳任广州刺史，大开鼓铸，广州始有冶铁业。南越王墓上出一件重26.5公斤越式大铁鼎（展品38号）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一件铁门枢轴，虽然已是锈层斑斑，状貌不扬，但却是作为南越国都城的广州早在二千年前，已有冶铁手工业存在的“铁证”，因而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还要特别提到的是，1994年黄埔区祠堂晋墓群的重要发现。已发掘3座砖室墓，保存完好，第2号墓有“永嘉元年”的纪年砖文，所出的陶瓷器物类同，可能是同一家族墓地。上出一批青釉器，多施有褐色点彩，还有多子、耳杯盘、虎子等（126、127、131号），与江淮及中原地区晋墓所见相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还有滑石调牌（相当今之名片）和类似墓志作用的铭牌（72号）与“关内侯印”石印（明器）、银质龟钮“将军将印章”官印（71号）至为难得。它既可说明墓主梁盖的身份，对于研究当时番禺（今广州）与增城县的史地关系和梁氏族望都很有价值。还有陶马甗、牛栏、猪羊圈、鸡屋以及贮粮的和井、灶（116~122号）等模型明器，是广州晋墓中所罕见的。墓主随身陪葬的2把坏首铁刀一长一短，短的一把身長60厘米，前段的11厘米做为两刃有中脊的剑身，把劈杀与刺杀的功能合而为一，成了独特的刀剑合璧，在中国古代的铁兵器中尚属首见。更为精彩的是，第2、3号两座墓出土了3块陶制水田模型，水田上建有农夫在犁田的，在肥田的，在修治农具的，在开挖排水沟的，还有已蒔秧完毕扛起农具正欲离开的各种人物与耕畜的形象。家鸡带到田头放养，田埂上放有一个覆盖严实的大竹箩，表示连午饭亦已带备田间。每块水田的田埂边处都安装1个捕鱼的竹笕，鱼儿是跟潮水到来的，显示这些水田属于珠江三角洲近海有潮水到达的连片沙田。真是好一派早春开耕的农忙情景。当然，这些随葬物是用来显耀墓主人的富有，为一方的豪大家族；同时，也是西晋后期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北方战争频仍，经济凋敝，中土人士大批南迁，而南方地区相对稳定繁荣的一种反映。在广州的晋墓常见“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砖文。广西梧州的晋墓也有“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等砖文发现，这些古

语砖文连同上述姬堂晋墓出土的陶制水田、粮囤和各种禽畜的圈舍，十分形象地展示出誉为岭南粮仓和鱼米之乡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当日如何丰盛康平的一幅历史图象。

陶瓷器是广州各博物馆藏品中的大项。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入藏的吉瓷，除了唐宋时期南方浙江越窑和龙泉窑的吉瓷，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北方耀州窑和河南临汝窑的吉瓷，河北邢窑、定窑的白瓷，磁州窑的黑白瓷和钧窑的变釉等六大窑系的产品外，还有宋元以后的釉下彩青花，釉里红、青花加彩、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和广州的织金彩等名瓷产品，都拥有一定数量或珍稀品。广州博物馆所藏则以广州汉陶最具特色。这批汉陶都是建国以来广州地区考古发掘的出土品。其胎质、火候、制作、施釉以及器形纹饰等方面都有浓烈的地方色彩，是上承先秦时期本地区的印纹陶工艺传统而来。纹饰方面则以几何图形戳印为特点的拍印纹和精细的刻划纹为主要；器形中以各式瓮、罐、联罐、联盒、熏炉、匏壶以及屋、仓、冢、井、灶的成套模型明器最有地方特点。就目前所见，广州汉陶除了遍布两广地区外，在邻近的福建、江西和湖南的衡阳、长沙等地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所藏明清以来广东石湾窑的艺术陶瓷，不仅数量大，而且精品多。明代的吴南石堂、昇明、杨昇、可松、祖唐居等名家之作尽有；清代的有“仿钧蓝釉而胜于钧”，擅仿历代名窑的制品；还有备受称誉的动物、人物作品，其塑形大胆夸张，粗放简练，刻划传神，散发出浓烈的民间生活气息。

玉器则以南越王墓所出200余件（套）为重要。这批玉器不仅数量大，品类多，雕镂也极为精美，被誉为汉玉之大观。其中有71块玉璧、11套组玉饰、58件玉剑具和5件玉容器皿至为精彩。由于墓葬保存完整，未受盗扰破坏，因面对研究各种玉器的使用功能方面有了可靠的依据。墓主身穿的“丝缕玉衣”，由2291片玉片组成，这是汉代考古发现完整的玉衣中年代较早的，又是仅见的一套。

广东石雕以潮州地区的作品为精，展品188号的花岗石镂雕加彩雀替，在坚而脆的石质上雕镂出玲珑剔透的型体，真的有百炼钢化绕指柔的神奇。位居中国四大名砚之首的端砚，以石质优良，雕工奇巧闻名于世。今次选展的6方端砚，分属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制品，从中已多少可看出年代早晚在砚型与雕工上的不同。其中展品182号是1956年12月从广州动物园麻鹰岗一座初唐的残墓中出土的（该墓打破56东麻M2东汉建初元年砖室墓的墓道）。唐李肇的《国史补》说：“内丘白瓷碗（即唐代邢州内丘县的白瓷碗），端州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这件唐代端砚和展品137号邢窑白瓷碗（共2件同为1954年广州建设新村唐大中十一年墓出土）是广州已发现众多的唐墓中仅见的孤品。这就表明所谓“天下无贵贱通用”，或许只是文人的夸张之词，事实上，端砚与邢瓷在唐代同属珍贵的物品。

金银器属于贵重金属制品，无论是考古发现或传世的馆藏都颇为珍稀。目前中国境内已出土有4枚西汉年间的金印，其中的3枚出自象岗南越王墓。一为“文帝行玺”、一为“泰子”、一为“右夫人玺”，这3枚金印除了可与《史记》、《汉书》的南越（粤）传和印证外，就从印玺学的角度来说，也增添了最新的资料。同墓出土的一个带瓣纹银盒，还有焊珠金饰件，展品68号

《史记》、《汉书》的南越(粤)传相印证外,就从印玺学的角度来说,也增添了最新的资料。同墓出土的一个蒜瓣纹银盒,还有焊珠金饰件,展品68号串珠饰品中的十二面焊珠金球和西汉的蓝色玻璃碗等,同是来自西亚等地的舶来品,是经过“海上丝绸之路”输来。广州的牙雕、广钟、广彩在清代颇有盛名,亦与海路对外通商贸易有关。

清代的金漆木雕神亭(展品193号),是一件较能代表广东潮州木雕风格与技艺水平之作。明清时期的竹雕则以江苏为著。本选集收录的明代宋纁祖孙三代和清代吴之璠、封锡禄、周颙、潘西凤四大名家的作品(展品202—206号),亦为全国所藏明清竹雕品中较为珍贵的。

书画藏品中选录34件。其中北宋文同《墨竹图》和元代李行《红竹图》,二者均为清代广东著名书画鉴藏家吴荣光旧藏。《墨竹图》入藏后1980年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展览。容庚价赠的明代戴进《山高水长卷》,为戴画罕见的巨构。清初著名画僧弘仁《黄山始信峰图》,为其黄山图景系列中最精美的作品。广东名画家作品,明林良的《秋树聚禽图》美术界公认为林画传世精真新代表作。清初张穆《七十龙媒图卷》,画各种性情体态的马数十匹,形神兼具,该卷为香港杨铨捐赠。清晚期苏六朋《东山报捷图》,苏仁山《五羊仙图》,所画人物意气风发,各具特色。书法作品,明初陈献章茅笔行草书和清初彭睿璋的竹本派草书都极见功力。本集选刊的全国各地书画作品各有其代表意义,而明清广东书画家作品,则显示有开拓创新精神。

四

文物所具有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文物本身所固有的,它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但人们对它们所具价值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只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深化。我们深知,上述的一些介绍和评议,也许是很肤浅的,甚至有不当之论,冀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再者,广州的博物馆虽然出现较早,但先天不足,后天欠调。各馆在藏品方面与多、精、全的要求距离很远;在馆舍与设备上更显得落后和管理欠善等等。这些除了要求我们文物、博物馆工作者必须努力再努力外,更希望于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鼎力支持,俾广州的文物保护与博物馆事业得到扎实的较快的发展。

1996.12. 冬至日定稿于羊城寓所

铜 铁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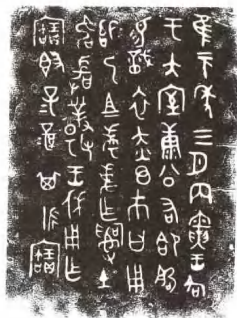
BRONZES AND IRONS



1. 刺鼎 西周穆王时 (约前1001)
Bronze Ding-vessel marked La (c.1001BC)



2. 鬲 鬲 西周 (前11世纪~前771)
Bronze Li-vessel marked 口口 (11th century~771BC)



3. 驹鑑 西周 (前11世纪~前771)
Bronze Gui-vessel marked Qu (11th century~771BC)



4. 铸叔簠 春秋（前770~前476）
Bronze Fu-vessel marked Zhu-shu (770~476BC)